



中国现代文论史

第3卷 / 丛书主编 王一川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Theory

制度的后果

中国现代文论的体制构型

胡疆锋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现代文论史

第3卷 / 丛书主编 王一川

制度的后果

中国现代文论的体制构型

胡疆锋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论史. 第三卷, 制度的后果: 中国现代文论的
体制构型/胡疆锋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7
ISBN 978-7-303-21143-2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
批评史—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9211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 //xueda. bnup. com

ZHONGGUO XIANDAI WENLUNSHI DISANJUAN ZHIDU DE
HOUGUO ZHONGGUO XIANDAI WENLUN DE TIZHI GOUXING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 bnup. 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56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08.00 元

策划编辑: 王则灵

责任编辑: 李洪波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段立超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总 序

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界，曾先后出现过林林总总的新的文学观念、思想或思潮——它们在这里被统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或简称中国现代文论。这些被视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东西与同时期同样新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现代文学作品一道，通过影响诸种不同读者的心灵，而在现代社会革命进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现代社会革命进程有力的推动力量。对这样的中国现代文论展开追溯、论析和评价，当然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但问题在于，今天从事中国现代文论史编撰，首先需要辨明的是，当中国现代文论史著述已出现过若干种，而它们已从各自不同角度向人们重新打开中国现代文论历程中的多样景致时，现在再来着手编撰新的中国现代文论史，是否有必要？确实，现在来编撰一部新的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起码前提就在于，必须确保能在中国现代文论史观上或多或少地呈现新东西，至少是有所出新。如此，在文论史观上出新就应是我们中国现代文论史编撰的唯一选择。但是，要在前人和时贤业已倾力创新的中国现代文论史编撰领域另觅新径，谈何容易？！我们只能勉力为之。



中国现代文论，也可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在这里大约是指相互交融而难以分割的四个层面的东西：第一层面是指那些明确表述出来的文学思想或理论，例如梁启超倡导的“诗

界革命”“文界革命”及“小说界革命”三大文学革命主张；第二层面是指在一定的文艺共同体（由一定数量的作家、文学批评家或文学理论家组成）内外标举或响应的那些相互关联的诸种文学思潮，例如，五四时期的“为人生而艺术”潮流、后来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第三层面是指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论著中表述或蕴含的相关文艺或美学观念，例如冯友兰《新理学》中有关艺术的论述；第四层面是指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或显或隐的文学观念、艺术观念或美学主张等，例如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对湘西边远山乡中纯美情感的追求及其所呈现的深层文学与美学观念。这些层面的文学思想、思潮及观念共同编织成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声部交响曲。

相对而言，本书固然会主要讨论上述第一、第二层面的文学理论，但在需要时也会对第三、第四层面有所涉及。

二

中国现代文论史可以被视为一个包含若干长时段的超长时段连续体。清末至20世纪70年代为第一个长时段，可称为现代Ⅰ时段，而20世纪80年代至今可称为现代Ⅱ时段。本书将主要探讨中国现代文论史的现代Ⅰ时段，至于现代Ⅱ时段状况，则应另行研究。

就具体的时段或时间来说，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论域由三个时段组成：直接的主要论述时期现代Ⅰ时段称为主时段，与此时段存在关联的那些时段为关联时段，而有所延伸的时段为延伸时段。中国现代文论史的主时段为1899年“诗界革命论”（梁启超）提出至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前；其关联时段为鸦片战争至庚子事变；其延伸时段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过，现代Ⅰ时段本身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前后两个中时段：清末至20世纪40年代为现代Ⅰ时段前期，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为现代Ⅰ时段后期。这里将把中国现代文论史的现代Ⅰ时段前期状况作为直接论述对象，但同时也会适当涉及关联时段和延伸时段。

三

这部中国现代文论史著述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中国现代文论史是中国我者(或自我)与外来西方他者之间文化涵濡的结晶。涵濡，是一个中国词语。涵是指包容或包涵，即把外来的东西包容进自身躯体之中；也指沉或潜，即把外来者不仅包容进来，而且还能沉入自身躯体之中，直到潜入最基础的底层。濡则有沾湿或润泽、停留或迟滞及含忍之意。合起来看，涵濡的基本意思在于雨水对事物的包涵和滋润状态。可见，涵濡带有包涵和滋润之意，以及更持久而深入的濡染、熏陶或熏染之意。它可以同现代人类学的“濡化”(acculturation)概念形成中西思想的相互发明之势，共同把握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在 20 世纪实际经历的相互润泽情形。

应当看到，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各自的身份及内涵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历史地变化的，在不同的时段有其不同的呈现方式以及关系状况，正是这种身份及内涵变化会影响到现代文论本身的发展和演变。

同时，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发生关系的社会语境本身也是变化的，正是这种社会语境变化会对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的关系状况及其演变产生根本性影响。

由此，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的涵濡会导致中国我者发生微妙而又重要的变化，其结果是，让中国我者既不同于其原有状况，也不是西方他者的简单照搬或复制，而是一种自身前所未有、西方他者也从未有过的新形态。这种新形态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现代文论。

正是在如上意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论史是现代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文化涵濡的产物。在中国现代文论界曾先后登上主流地位的“典型”与“意境”范畴，正是一对平常而又重要的范畴实例。应当讲，来自西方的“典型”范畴在西方 20 世纪文论界本身并没有像在中国现代

这样主流过(尽管曾经在苏联文论中主流过);同样,来自中国古代的“意境”范畴在中国古代文论界本身也没有像在中国现代这样主流过(尽管明清时代曾有人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过)。实际上,它们之所以能盛行于中国现代文论界,恰恰应当归结于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的文化涵濡或濡化,也属于这两者之间文化涵濡的结晶。就“典型”来说,中国古代以金圣叹小说评点为代表的人物性格理论,已为西方“典型”范畴在中国的涵濡准备了合适的土壤、气候等文化条件,而亟需拯救的中国现代文化危机则成为“典型”登上中国现代文论主流宝座的有力推手。而来自西方的以尼采的“醉境”(或酒神状态)与“梦境”(或日神状态)等为代表的美学理论,以及以黑格尔的“时代精神”和斯宾格勒的“文化心灵”等为代表的哲学及文化理论,也为中国古代“意境”(或“境界”)理论在现代的复兴及大放异彩提供了强烈的比较发明诱因。尽管在论者因不满足于“典型”的独尊地位而倡导将“意境”作为与之平行的美学范畴提出之初(1957),“意境”概念并没有立即在中国热起来,但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深化,“意境”作为中国文化与艺术在全球化时代当然的原创性和独特性标志,而逐渐与“典型”一道成为“美学中平行相等的两个基本范畴”^①,乃至后来逐渐成为取代“典型”范畴而一枝独秀的美学范畴。由此看来,无论是人们已经论及的“典型”还是“意境”范畴,或者本书提出的“感兴”范畴,它们之所以能成为或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核心范畴,恰是由于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发生了持续的文化涵濡的缘故。如此,要想弄清中国现代文论这对重要范畴的兴衰,假如不从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的文化涵濡去把握(当然也应当同时从其他方面去把握),想必是难以全面完成的。

^① 李泽厚:《“意境”杂谈》,《光明日报》“文化遗产”,1957年6月9日、16日,据李泽厚:《门外集》,138—139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

四

这部中国现代文论史著述属于笔者担任首席专家的教育部 2005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在结项后的一项延伸和扩展性成果，共由四卷组成，依次由笔者与陈雪虎、胡疆锋、胡继华协力承担。在与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众多同行朋友协力完成该项目的结项成果《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之后，我们再集中大约七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四卷本著作的撰写工作。如此，这部著作的研究、写作及修改过程不知不觉中竟然已前后历时十多年。

这四卷除了第一卷为总论外，其余三卷都大体按照时间进程的推移或交替去安排，第二卷主要停留于清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之间，第三卷聚焦于民国初年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第四卷着眼于五四时期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不过，与此同时，包括第一卷在内各卷的主要议题或任务诚然各不相同，各有侧重点，但它们之间又都存在复杂的关联性及其持续的缠绕，因而相互之间呈现交叉、回溯、照应或打通等态势，又实在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只有这种分工的相对性和交融互通的密切度，才更有利于进入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进程之中。因此，当有的人物、事件、观念、命题或案例在各卷中数度重复出现或交叉，甚至被赋予不同的阐释任务时，都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第一卷为中国现代文论传统。这属于全书的总论部分，概要地阐述中国现代文论若干方面的特征，由本人撰写。中国现代文论传统不是来自对西方文论的简单照搬，而是有着自身的现代性缘由。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被视为“世界之中国”时代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持续的层累涵濡进程的产物。置身在持续的层累涵濡过程中的中国我者与西方他者之间的关系总是具有相对性和变化性，这导致异质他者总是不断地被涵濡进自我的机体中，转化为自我的一部分。中国现

代文论传统可以由其知识型、核心范畴及其位移、我他关系模型及双重品格得到呈现。在心化美学与物化美学的对照及兴辞美学方案中，可见出中国现代美学Ⅰ时段与现代美学Ⅱ时段的分化与联系。中国现代文论传统的特点还可从与中国现代型文学传统的特征及其大海形象个案的比较中见出。

第二卷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探究清末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轨迹，由北京师范大学陈雪虎撰写。需要暂且搁置我们后人想当然的清晰概括，重返当时的文论发生现场（假如有的话），尽力窥见其时本来就有的多元选择中的困惑与执着、拒绝与对话、冲突与调和等不同面貌。从知名的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胡适等以及未必知名的朱希祖等人物的选择可见，中国现代文论从其发生赋形时段起就呈现为多元取向中的张力式构造及历时与共时交互缠绕的复杂过程。无论是其顽强守护中国我者固有传统的方略，还是其果敢拿来西方他者的精心筹划，都呈现出多重方案或多种可能性，以及逐渐演变或寻找的复杂性。通过尽可能多地检视当时的不同陈述、查阅新近研究成果、引证时贤多种不同的论说，多方面地贴近中国现代文论发生期的内在的张力状貌和多重选择的困窘，构成该卷的自觉追求和特色。

第三卷为中国现代文论的构型。探讨中国现代文论如何以多层面的体制化方式进一步形塑自身的生存方式并发生演变，该卷由首都师范大学胡疆锋撰写。该卷的新意在于走出过去单一的思想辨析路径，尝试从学术体制与文论思想之间的关联性视角，也就是从知识制度的大众传媒、现代大学、文学社团、政党文艺政策的综合与交融视角，具体勾勒中国现代文论尽可能完整的制度化转型面貌及其具体的生成与演变轨迹，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论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多层面之间的交汇以及历时与共时之间的交融图景。正是借助于这种综合与交融视角，通过大量的具体案例分析，该卷揭示了中国现代文论在其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制度化转型状况，表明假如离开这种多层面制度转型，中国现代文论那些已经呈现或尚未完整地呈现的特质就是不可思议的或难以理解的。

第四卷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元取向。分析中国现代文论中的文化涵濡与多元文论思想秩序，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胡继华撰写。该卷选取精神史与文化涵濡的视角，从纷纭繁复的现代文论观念、命题或思潮中，尽力梳理出几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理论主张或文艺思想，看看现代耳熟能详的或者暂且被遗忘的那些文艺思想，是如何在当时以自身面貌呈现出来的。人文主义、道德理想主义、社会主义和象征主义正体现出其时的多元思想景观。甚至其中的象征主义思潮内部，还可细分出诸如梁宗岱的象征诗学、李长之的理想人格论、宗白华的“中国艺术心灵”、冯至的浪漫主义、闻一多的古典主义、陈寅恪的史诗互通论和钱钟书的跨文化诗学等不同思想选择。当代人从这些不会被遗忘的多元思想取向及著者自己有关天文与人文汇通和中西诗学互化的构想中，可以得出怎样的反思？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是四人合作的四卷本著作，除了各卷承担不同的分析任务，而在人物、思想、事件、社会文化语境及其他相关现象方面有时会略有重叠或交叉外，各位著者在学术上也各有其学术积累、治学专长和文论主张，因此，虽然彼此做过相互协调和统一的共同努力，但终究还是各有其特殊性或个性显露。这应当说也是合理的，因为笔者所设想的学术合作，不再是消除个别性或差异性的完全同一，而是带入差异和体现个性的“和而不同”的共同体。不过，在关于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面貌、主线、分期、制度、知识型、核心范畴及品格等主要问题上，各位著者之间的相互协调立场仍然是接近的，尽管难免仍存有不同。



2019年1月22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导 论	1
一、一道试题难倒四千才俊	2
二、知识制度：界定与建构	10
三、知识制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与文论研究	15
第一章 从田园型到都市型：中国知识制度的现代变迁	26
一、中国传统知识制度的特点——以《文心雕龙》为例	26
二、西方现代知识制度及其特征	36
三、从晚清到民国：西方现代知识制度的中国化过程	43
四、从田园型到都市型：中国文论生产模式的转型	50
第二章 学术交流和生产场域：大众传媒与现代文论	55
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传播方式	57
二、晚清到民国的书刊出版	59
三、大众传播和文论生产	65
第三章 学术的职业化与学科化：现代大学与现代文论	95
一、现代大学制度与中国文论生产	96
二、学术分工与文学学科的独立	119
三、文艺学学科的制度化与文论生产	126
第四章 学术共同体的引领和催生：文学社团与现代文论	149
一、作为学术共同体的现代中国文学社团	150
二、现代中国文学社团的特点和态势	153
三、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格局与文学话语建构	169
四、文学社团：集体认同和整体管控	181

第五章 知识立法和权力控制：政党文艺政策与现代文论	188
一、外在知识制度与中国现代政党文艺政策	190
二、中国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与文论生产	194
三、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与现代文论	226
四、定于一：现代文论生产的一体化趋势	240
结 语	245
参考文献	252
后 记	266
表 目	269

导 论

本卷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论^①生成过程中的制度因素。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学制度研究在海内外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蔚然成风，这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文论研究。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文论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媒介、教育、社团、文艺政策等制度因素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② 这些著述的研究价值和启发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作为后来者，我们总要面临超越前人工作的任务，总要面对和回答一些未被充分解决的老问题或不断被发现的新问题，比如，中国是否存在着某种整体的知识制度？如果存在，这种知识制度对中国文论的影响到底体现在何处？它是否影响并决定了中国文论知识的生成和构型？从制度的视角看，中国现代文论家与古代文论家的区别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一些具体的制度因素是如何渗透在现代文论的生产过程中的？比如，现代报刊书局是如何介入文论生产的？现代学者的职业和经济状况对其研究又有着哪些影响？文学社团的活动和文论家的主张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权力机构和执政党的文艺政策对文论的规训和导向发挥了哪些作用？等等。

这些相关的制度问题在以往的文论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审视和解答，在许多时候，它们要么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要么被放置在中国文化语境、社会背景等介绍中含含糊糊地一笔带过，要么仅仅被当作

① 本卷所说的“文论”指的是广义上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批评”的含义大致相同。

② 文论领域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程正民、程凯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黄念然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曾守正的《权力、知识与批评史图像——四库全书总目诗评类的文学思想》（台湾学生书局，2008）。

零碎的史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对制度层面的综合问题，对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制度因素与现代文论的复杂关系，我们仍然不甚明了。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在研究18世纪的法国文学制度时曾经这样说过：

重建社会是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历史学家从事这项工作，并非出于挖掘档案和翻检古老文件的古怪热情，而是因为渴望与逝者交谈。通过拷问文献，倾听答案，历史学家不仅能听到逝者的灵魂，而且能衡量他们寄身的社会。如果我们与过去的世界断绝了联系，就只能生活在一个二维的世界里——时间凝固的现在，我们的世界也会变得平板。^①

从某种角度看，本卷也是一次达恩顿所说的“重建行动”的尝试，是一次围绕知识制度“重建”文论知识“社会”的尝试，是一次通过“拷问”“倾听”和对话来发现、描绘丰富的、多维的现代文论世界的尝试。

在进入正题之前，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知识制度的影响力及其对文论的作用，我们不妨先从文论史上一个非常经典但很少引起关注的案例——清朝嘉庆壬戌年会试事件——说起。这个案例堪称文论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总结它的文论史意义，进而考察中国传统知识制度的特点及其现代变迁，有利于整体把握中国文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拓宽文论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推进当代文论建设。

一、一道试题难倒四千才俊

在中国文论史上，清朝嘉庆壬戌年(1802)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份，这一年的文坛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也没有经典的文论著作问世：中国

^① [美]罗伯特·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刘军译，前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古代文论的名篇——叶燮的《原诗》——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完成，中国文论史的雏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①此时已出版十来年了。不过，对于中国文论来说，这一年确实出现了值得一提的事情：这一年的三月初六，在三年一次的科举会试第三场“策问”考试中，时任主考官的礼部尚书纪晓岚（纪昀）出了一道标准的文论试题，考试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应试的近四千个举人考得一塌糊涂，几乎全军覆没。关于这一事件，前人多注意到了纪晓岚把文论知识引入科举考试的创新之举，但对后人来说，考生们的集体失语似乎更是意味深长，这一事件暴露出的制度、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实在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不妨先看看这道试题：

问：屈宋以前，无以文章名世者，枚马以后，词赋始多；《典论》以后，论文始盛，至唐宋而门户分，异同竞矣。齐、梁、陈、隋，韩愈以为“众作等蝉噪”；杜甫则云：“颇学阴何苦用心。”李白触忤权幸，杜甫忧国忠君，而朱子谓“李杜只是酒人”。韩愈《平淮西碑》，李商隐推之甚力，而姚铉撰《唐文粹》，乃黜韩而仍录段文昌作。元稹多绮罗脂粉之词，固矣；白居易诗如十首秦吟，近正声者原自不乏；杜牧乃一例诋之。苏黄为宋代巨擘，而魏泰《东轩笔录》，诋黄为“当其拾玃羽，往往失鹏鲸”；元好问《论诗绝句》亦曰：“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凡此作者论者，皆非浅学，其抵牾必有故焉。多士潜心文艺久矣，其持平以对。^②

这道试题的“题干”多出自纪晓岚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诗文评”部分。^③ 纪晓岚在试题中列举了古人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发生抵牾的诸多例子，如韩愈与杜甫对齐、梁、陈、隋之诗，朱熹和一般学者对李杜，李商隐与姚铉对韩愈之文，杜牧和一般学者对元白之作，魏泰

① 朱自清先生认为《四库全书总目》的诗文评“不失为系统的文学批评”，可以将其看作文学理论（批评）史的雏形。参见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载《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2版，2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② 《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二《策问五道》，14页，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③ 详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诗文评”导语、《临汉隐居诗话一卷》《彦周诗话一卷》《紫薇诗话一卷》等部分。

与元好问对苏轼、黄庭坚，等等。他追问的核心问题是：面对相同的文学研究对象，同样都是杰出的学者，他们的审美判断为什么会如此矛盾？

现在看来，这道考题涉及文学风格、修辞、读者接受、文学流派、审美情趣、文学批评标准等重要问题，要答好确实不易，但也说不上过于艰深。如果让当下中文专业的本科生^①或研究生^②来回答，可能回答得不一定有多么深刻全面，但相信他们多少能根据在“文学概论”课程中学到的理论（如“知人论世说”“接受美学”“文学风格”“批评方法”等）说出一些门道来。然而，当年这道题的回答情况却实在让人惨不忍睹：四千举人中，除了一位叫朱士彦的考生之外，大部分交的是白卷或文不对题（“四千人莫余答也”，“无以对答者甚多”）！有意思的是，朱士彦本来已经被判落第，却因为从文学流派的差异和文学论争（南方人/北方人、江湖派/江西派）的角度进行了自己的解释，纪晓岚认为他“词意晓然，未可执为定论也”，富有“洞见”，欣然把他补录榜中。^③

① 用本科生作为举人的参照只是权宜之举，这是因为科举功名与现行学位是不对应的，不能像利玛窦那样把秀才、举人、进士和学士、硕士、博士简单地等同起来（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36—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不过，由于两者都代表一定等级的学术水平，因此也并非完全没有可比性，比如在明清时期从进士中选拔出来的庶吉士或翰林大致类似于现在的硕士，甚至博士，那么，进士的后备军——举人——的学术水平可以认为接近于本科生。参见谢桂华：《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卷》，12—1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② 中国古代书院在培养研究人才、提倡学术、增进知识诸方面均有积极影响，胡适曾把书院的培养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相提并论，为它的消失大感惋惜：“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它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参见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第3期，1924年2月10日。

③ 《纪文达公文集》记载：“东坡才笔，横据一代，未有异词。而元遗山《论诗绝句》乃曰：‘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苏诗百态新’；又曰：‘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言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二公均属词宗，而元之持论，若不欲人钻仰于苏黄者，其故殆不可晓。余嘉庆壬戌典会试三场，以此条发策，四千人莫余答也。惟揭晓前一夕，得朱子士彦卷，对曰：南宋末年，江湖一派，万口同音，故元好问追寻源本，作是惩羹吹齏之论；又南北分疆，未免心存畛域，其《中州集》末题诗，一则曰：‘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一则曰：‘若从华实论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词意晓然，未可执为定论也。喜其洞见症结，急为补入榜中。”见纪晓岚：《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抄序》，《纪文达公遗集》第9卷，35页，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更让人惊叹的是，“准落榜生”朱士彦不仅凭此奇迹般地改变了落第的命运，还一路杀入殿试，成了当年的探花！^①

以往，在评价这次事件时，人们多注意到了纪晓岚以文学批评入题的“别出心裁”。比如，纪晓岚“以文学批评史策士，在当时自属创格”^②，“纪氏以此策士，在清代乃至历代科举考试中，自属开创之举”^③。但遗憾的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明显被人们忽略了：举人作为清朝知识分子阶层的杰出代表，堪称全国的学术精英，为什么四千才俊只有一人答出了此题？纪晓岚的“开创之举”，为何遭遇如此尴尬的结果呢？这只是一个偶然现象吗？

此外，还有一个不应被忽略的情况是：文学批评试题进入会试，这在清朝并非孤例，仅仅在六年前，即嘉庆丙辰年（1796），当时的主考官也是纪晓岚，他已经在“策问”考试中考过文论方面的题目。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两次的考题居然颇为相似！1796年的原题如下：

齐梁绮靡，去李杜远甚，而杜甫以阴铿比李白，又自称“颇学阴何”，其何故也？苏黄为元佑大宗，元好问论诗绝句，指为“沧海横流”，其故又何也？王孟清音，惟求妙悟，于美刺无关，而论者谓之上乘；元白讽谕，源出变雅，有益劝惩，而论者谓之落言论，涉理路；然坎否坎？击壤流为濂洛风雅，是不入诗格者也，然据理而谈，亦无以难之；《昌谷集》流为铁崖乐府，是破坏诗律者也，然嗜奇者众，亦不废之；何以救其弊坎？北地，信阳以摹拟汉唐，流为肤滥，然因此禁学汉唐，是尽徇古人之规矩也；公安，竟陵以“摹甲新意”，流为纤佻，然因此恶生新意，是徇天下之性灵也，又何以酌其中坎？^④

这五个问题，涉及自六朝至明代之千年诗史流变历程，以及阴铿、李

① 朱士彦高中探花一事，可参看仲光军等：《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清代试题试卷》，586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

②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32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③ 蔡镇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492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

④ 《纪文达公遗集》，11页，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卷第十二《策问》。